



關懷專業的省思 ——關懷倫理學與社會工作

張英陣

壹、社會工作是關懷專業

我們的日常生活中經常使用「關懷」或「照顧」這樣的語彙，可能是因為習以為常，反而很少深入探究這些用語的意義。社會工作實務中也是經常使用「關懷」或「照顧」這個詞，像是「社會照顧」、「社區照顧」等，而且社會工作聲稱是一項「關懷的專業」（a caring profession）（布蘭達·杜布瓦、卡拉·克羅格斯拉德·米利，2021；Lloyd, 2006）。但是何謂關懷、照顧？關懷、照顧的本質為何？在社會工作的文獻中則很少被深入探討，似乎「關懷」或「照顧」這個概念是一件不證自明的事。特別是在追求科學社會工作的過程中，著重理性、邏輯和證據，關懷照顧理應是社會工作實務的核心，反而成為社會工作「被隱匿的聲音」（hidden voices）（Weick, 2000）。「關懷」或「照顧」（caring or

care）在中文的文字與語言的表達上，會因脈絡的不同有所差異，在英文的使用上 caring 和 care 有時也很難區別，因此在本文中不刻意區劃分「關懷」和「照顧」，兩個詞是互通的。

關懷倫理學（ethics of care or care ethics）是1980年代初期新興的道德哲學觀點，開啟了對「關懷」、「照顧」的價值和意義的探討。關懷倫理學有別於主流的義務論（deontology）和效益論（utilitarianism）的觀點，為道德哲學開拓更多元的視野。教育、護理、諮商輔導、管理等專業領域也逐漸有人採用關懷倫理學的觀點於實務工作中，但號稱「關懷專業」的社會工作反而較少運用關懷倫理學。或許是主流的義務論和效益論仍舊主導著當前的社會工作倫理守則，新興的關懷倫理學對實務工作仍相對陌生。本文無意批判或排斥義務論、效益論以及1950年再度復興的德行論（virtue ethics），而

是希望藉由介紹關懷倫理學的觀點，讓社會工作者在實務的倫理判斷過程中多一項可以選擇的觀點。因此，本文將簡介關懷倫理學的發展、關懷倫理學的核心主張、以及關懷倫理學在社會工作實務的運用。

貳、關懷倫理學的興起

雖然關懷倫理學的核心理念具有悠久的哲學傳統，但是多數學者公認近代關懷倫理學肇始於Carol Gilligan於1982年出版的《不同的聲音：心理學理論與婦女發展》（*In a different voice: Psychological theory and women's development*）（Gilligan, 1982），這本書發想自Gilligan自己於1977年所發表的〈不同的聲音：女性的自我與道德概念〉（*In a different voice: Women's conceptions of self and morality*）（Gilligan, 1977）這篇文章。Gilligan曾與知名的心理學家Erik Erikson及Lawrence Kohlberg共事，她發現這些心理學家的研究對象有一大半是女性，可是他們的研究結果卻很少呈現出女性的聲音，甚至Kohlberg的道德心理學對女性存在著負面的見解。由於Gilligan本身也投入於民權及反戰等社會運動，更能體會發出聲音的重要性，既然諸多的心理學家像是Freud、Piaget、Erikson及Kohlberg的研究都缺乏女性的聲音，因此她決定透過其著作呈現出女性「不同的聲音」（Gilligan, 2018）。

Gilligan認為Kohlberg的道德發展階段論基本上是一種傾向男性道德推理的「正義倫理」（an ethic of justice），「正義倫理」建立在人是理性自主的獨立個體之人性觀，強調公正、平等、個人權利與抽象原則；而女性所展現的是「關懷倫理」（an ethic of care），相信人需要相互依賴，著重關注、信任、回應需求與關係。當Gilligan提出「正義倫理」與「關懷倫理」後引發了許多學術的論辯，甚至有人批評區分男性的「正義倫理」和女性的「關懷倫理」是不適當的。不過批評者可能有所誤解，Gilligan之所以如此區分只是要喚醒大家關於道德發展是可以有不同於義務論與效益論的觀點，我們需要從父權聲音的典範轉換至關係聲音的典範，不管是哪一種性別都可以具有「正義倫理」與「關懷倫理」，但不應僅以「正義倫理」作為道德判斷的唯一準則。

臺灣對於關懷倫理學的引介，除了Gilligan的觀點之外，討論最多的應該是教育哲學家Nel Noddings的關懷倫理學（方志華，2001；游惠瑜，2005），雖然Noddings的觀點主要是在教育學領域，特別是道德教育的議題，但她也關注於遊民的社會政策與實務（Noddings, 2002）。Noddings認為依賴（dependency）和關係（relation）是人類的「初始條件」（original condition），因此道德生活與道德教育就是要培養關懷的關係（caring

relation)。從關懷的關係來認識社會，我們會更需要傾聽他人的聲音。照顧者需要關注被照顧者，照顧者應放下自己的價值與預設，盡力傾聽被照顧者的需求；雖然照顧者與被照顧之間的權力關係經常是不對稱的，但被照顧者也需要適度回應照顧者的關懷，因為照顧者與被照顧的關係是相互依賴的（Noddings, 2010a; 2010b）。

Noddings所主張的關懷關係承襲了Sara Ruddick之「母職思維」（maternal thinking）理念（Ruddick, 1980），認為母親與子女的關係是關懷關係的原型，這是一種本能的和天生自然的關懷。但是這種本能的關懷不是女性或母親獨特的特質，絕大多數的關懷倫理學的學者都反對「女性是天生的照顧者」這種主張，我們日常生活中認為女性比男性更適合從事照顧的工作也是一種迷思。除了本能及天生的關懷，仍需要將關懷關係擴充到一般的人際關係，甚至於全球國際關係，這就需要將天生的關懷轉化成倫理的關懷（ethical caring）。從歷史發展及各國文化的傳統來看，Noddings很清楚女性一直都是主要的照顧者，但這也讓女性淪為次等公民的重要原因，因為社會並沒有體認到照顧是人類生存最重要的工作，照顧工作的價值長期被貶抑。Noddings（2010b）強烈主張，健全的關懷倫理應該要幫助女性擺脫被壓迫的傳統，只有在關懷的社會中藉由

關懷的人，人類社會才能達成真正的解放和社會正義（Bergman, 2004）。

關懷倫理學經常被批評者誤解為僅能解釋面對面的微型關係。政治學家Joan C. Tronto於1993年所出版的《道德界線：關懷倫理學的政治論述》（*Moral Boundaries: A Political Argument for An Ethic of Care*）（Tronto, 1993）正式宣告，關懷倫理學對於關係的重視不僅是討論微觀的人際關係，而且關懷照顧這個議題更是個宏觀的政治議題。Tronto在該書中指陳，過去在討論照顧的議題時都認為是女性的道德（women's morality）議題，她主張應該摒棄這種女性道德的論述，而應直接討論關懷倫理（care ethics）。Tronto（1993）認為照顧的實踐不僅是個道德的概念，同時也是一種政治概念，而且在多元社會中的民主公民必須具備關懷的特質，而且也只有正義、多元的民主社會中，照顧才得以繁榮興盛。Tronto的主張引起許多領域的學者之回響，逐漸形成的共識是照顧不再是私領域的關係議題，而是一種道德理念，有助於強化社會與政治的道德（Engster & Hamington, 2015）。

Tronto在2013年的《關懷的民主：市場、平等與正義》（*Caring Democracy: Markets, Equality and Justice*）（Tronto, 2013）一書中，呼籲大家不應該僅是關心經濟赤字，全球所面臨的「民主赤字」

（democratic deficit）和「關懷赤字」（caring deficit）更值得關切。「關懷赤字」是指許多國家面臨的照顧危機，缺乏足夠的照顧者滿足老人、兒童、身心障礙者、疾病者的照顧需求（Tronto, 2013）。「民主赤字」意味著政府沒有能力回應公民的價值與理念，政治的宗旨理當是照顧關懷民眾，可是多數的政府卻將經濟發展列為第一優先。政府若能將照顧關懷列為民主政治的議題中，那麼政治生活變得更關懷和更加正義是可期待的。可是Tronto明確指出，目前的社會在照顧關懷上並不夠民主，主要的照顧責任之分擔相當不公平，許多弱勢族群、女性、少數族群承擔了更多的照顧責任，那些高社經地位者享受「不負責任的特權」（privileged irresponsibility）。尤其是照顧產業市場化與全球化之後更加劇了照顧責任分擔的不公平，從事照顧工作者多數是不支薪或低薪，先進國家引進移工投入照顧工作，卻讓移工的母國更缺乏照顧人力。Tronto（2013）認為關懷照顧不只是親密關係的照顧，而是一個政治的結構性問題，應該要關心那些制度和人能夠達成照顧的任務，仰賴市場機制是無法達成關懷照顧與民主的目標，民主國家的政府應該重視照顧責任的公平分擔。

關懷倫理學的發展確實是從女性的照顧經驗著眼，但這不意味著女性就是天生適合做照顧的工作，照顧關懷的特質和照

顧工作是任何人皆可承擔的責任。Gilligan之所以強調「不同的聲音」是因為女性的聲音長期被忽視，Ruddick所謂的「母職思維」和Noddings的母親與子女之關係都著重於女性實際的照顧經驗，重點不在於女性或母親這個性別角色。就如荷蘭的女性主義政治學者Selma Sevenhuijsen提出「從事母職之人」（mothering person）的概念（Sevenhuijsen, 1998），也是強調從事照顧工作是不分性別的，重點是具備關懷的特質與經驗。再者，關懷倫理學的初期發展可能引用較多的「母親」隱喻，經常被誤解為關懷倫理學僅著重於親密的面對面關係。經過Tronto的倡議之後，越來越多的關懷倫理學者，不論是哲學、政治學、教育、社會工作或醫護領域，多數人都承認照顧或關懷已經是一個政治問題，需要具有關懷的公共政策來面對全球的照顧危機。

參、關懷倫理學的人性論與本體論

與主流的倫理學觀點相比，關懷倫理學不僅是展現女性經驗的不同聲音，更深層的意義在於對人性論或人類社會生活之本體論提出不同的見解。長期以來，主導社會工作倫理觀點的義務論和效益論是建立在「經濟人」（homo economicus）的假設上。「經濟人」深信每個人都是

獨立自主的個體，況且是理性的行動主體足以精打細算，所以人應該都是能夠自我主宰（self-mastery）生命的人。關於照顧的責任是每個人要承擔的個人責任，家庭應該是照顧的主力，若個人或家庭無法善盡照顧責任則應該可以理性地在「照顧產業市場」中自由選擇購買服務（Tronto, 2017）。一個人若是要「依賴」他人的協助而且無法自立自主，那是個人的失敗；若是依賴政府的福利而生存，更是道德上的缺陷。所以社會上對「福利依賴」通常是抱持著負面的評價，因此社會福利政策與福利服務方案主要是以促進服務使用者獨立自主為目標。聯合國在1991年提出的「聯合國老人綱領」計有五個要點，第一個要點就是「獨立」（United Nations, 2019）；我國的《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1條的立法目的，直接明示促進身心障礙者的「自立及發展」（衛生福利部，2021）；《社會救助法》第15-1條指出，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要協助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積極自立」（衛生福利部，2015）。因此，在老人福利中有「健康自主管理模式」、身心障礙者有「自立生活服務」、社會救助有「積極自立脫貧計畫」、兒少服務有「自立生活計畫」等。在此再次重申，本文的論述並沒有要否定上述的「經濟人」假設，只是面對VUCA（volatility變動、uncertainty不確定、complexity複雜、ambiguity模糊）的

社會生活，不應侷限於主流的「經濟人」觀點，應該可以有另類的選擇來認識社會生活的本質，而關懷倫理學正是開拓了一個新的視野。

「經濟人」觀點認為人是理性的個體，所以要追求獨立（independence）與自主（autonomy）。可是關懷倫理學認為人的本質具有依賴性，前面已經提過Noddings認為依賴是人類的「初始條件」。英國的社會福利理論先驅Richard Titmuss（1907-1973）認為人類本身的生、老、病、死、天然災害等造成有天生的依賴性（natural dependency），而且也會因為戰爭、失業、意外事件等造成人為的社會性依賴（social dependency），因此他主張建立普及式的福利國家，透過集體的責任來滿足人類因各種依賴所產生的需求。Titmuss將依賴性視為人類社會的本質，而不是一種病態現象，這樣的觀點跟關懷倫理學的見解是一致的。關懷倫理學者認為在人的生命週期中，嬰幼兒時期、疾病的時候和老年時期都有較強的依賴性，即使是處在健康壯年時期的人，在日常生活的大多數活動也需依賴他人才能生存；而且人的依賴性也不僅是生物性的身體需求依賴，也包含心理的、情緒的、靈性的依賴等（Groenhout, 2004），這些所有的依賴性，也意味著每個人都有被關懷照顧的需求。

人之所以有依賴性，是因為每個人

都是脆弱的（vulnerable）。脆弱性代表一個人對世界和他人的開放方式，由於人對自己的心理、情緒和身體的掌控程度是有限的，因此需要對他人開放（Miller, 2020）。以往的學者大都以因脆弱性而導致傷害的負面角度來看脆弱性（張英陣，2021；Fineman, 2008；Mackenzie et al., 2014），但有越來越多學者開始關注脆弱性的正向能量。當我們願意卸下堅強的保護盔甲，真誠地去面對自己的脆弱時，而將我們自己開放給他人，會讓自己的生命變得更有意義（布芮尼·布朗，2013）。企業家Hubert Joly在《企業初心：未來企業的新領導準則》（修伯特·喬利、卡蘿蘭·藍柏特，2022）一書中分享了他經營企業的成功經驗，他認為追求完美是一種邪惡，完美主義會讓管理者創造出非人性的組織環境，因而破壞了企業的初衷。企業組織畢竟是個團隊，只有真誠面對自己的脆弱，將自己開放給他人，才能有效地促成團隊工作。

由於人類本質的依賴性與脆弱性，為了人類的生存及繁榮興盛，更需要人與人之間的連結。「經濟人」的觀點認為社會是透過原子化的個人依據理性的契約所形成，而關懷倫理學主張社會的本質就是關係（relation）。由於每個人的脆弱性，我們都需要依賴他人才得以生存或繁榮，每個人都是關懷照顧的接受者，同時也是照顧的提供者。Tronto（2017）提出「關

懷之人」（*homines curans*）的概念，主張人是社會的動物（social animals）也是關懷的動物（caring animals）。這種關懷的關係其實是一種相互依賴（interdependence）的關係，不僅是照顧者與被照顧者的二元關係，還包含圍繞在周遭的照顧資源提供者等多元的複雜關係，就如Eva F. Kittay所聲稱的鳥巢式互相套合之依賴（nested dependencies）（Kittay, 2020）。Stephanie Collins認為關懷倫理學的核心理念是「依賴原則」（dependency principle）（Collins, 2015），意指人類社會一旦有依賴的事實存在，就需有相對應的義務（duties）產生，而這些義務是對他者所必須承擔的責任。關懷倫理學的核心理念與法國哲學家Emmanuel Levinas（1906-1995）的見解相當一致，Levinas認為倫理學不是建立在自主（autonomy）的基礎上，而是要以他律（heteronomy）為基礎；倫理關係的產生始於他者，不是自我。我們要從他人身上的需要，看到自己的責任，Levinas強調人應該要超越自我，我們對他者是有責任的（Diedrich et al., 2006）。

關懷倫理學的人性論與社會本體論有別於義務論與效益論的「經濟人」和「原子化社會」的觀點，但關懷倫理學也不否認人是理性的，也沒有放棄追求人的自主性，只是更強調人是一種依賴的理性動物（dependent rational animals）

(MacIntyre, 1999)；也因為人是鑲嵌在社會關係之中，每個人都難以有完全的自主性，所要追求的是關係的自主性 (relational autonomy) (Mackenzie et al., 2014)。若我們能真心接受需求、脆弱、依賴和關係是人類社會的本質，那麼在主流的倫理學觀點之外，就有可能在倫理決策過程中有另類的觀點。

肆、關懷和照顧的意義

上一節從「關懷之人」的觀點說明關懷倫理學對人與社會本質的見解，接著進一步探討關懷和照顧的意義。由於關懷和照顧是日常生活中非常普遍的用語，一般人也習以為常，所以欠缺明確的定義。關懷倫理學的文獻中對於關懷和照顧最為經典的詮釋當屬Berenice Fisher和Tronto所提出的定義：

從最普通的層次來說，關懷是基於人類的生存，因而投入於維繫 (maintain)、持續 (continue)、和修補 (repair) 我們「世界」 (world) 的各種活動。所謂的「世界」包含我們的身體、我們的自我與我們的環境，及這些複雜交織而成的維繫生存網絡。(Tronto, 1993)

Tronto (1993) 認為這個定義有四項特徵：一是關懷不僅是人際之間的互動，也包含和物質環境的關係；其次是關懷不是兩人的雙向關係而已，更是許多人共同

交織的社會與政治關係；第三則是關懷有其文化脈絡，不同的文化對關懷的意義有所差異；第四是關懷是日常生活中持續性的活動，不時偶而為之的單次性活動。許多人批評Fisher和Tronto的這個定義太過廣泛且模糊，不過也因為它的廣泛性正足以反映出關懷活動的複雜本質 (Diedrich et al., 2006)，因為關懷本身就是人類生存所必需的諸多活動。事實上，這個寬廣的定義也正好符合關懷的社會工作專業「人在環境中」的理念。社會工作不只是在「修補」個人的問題，也同時在「維繫」、「持續」和「修補」人與人的關係及人與環境的關係。

為了具體說明關懷的多元面向，Fisher和Tronto提出關懷的五個階段，嚴格來說應該是五個分析面向，而每個階段都蘊含了某些倫理特質 (表1)。

這五個階段是持續性的實踐過程，彼此相互關聯，但未必有先後順序 (Tronto, 1993, 2013)。首先是關心 (caring about) 的階段，當有些人的需求沒有被滿足時，需要有人注意到這個問題。這個階段的倫理特質是關注 (attentiveness)，亦即要超越自我的利益，真正了解他人的需求為何，就好像社會工作實務中必須具備福利需求評定的能力，了解潛在服務使用者的需求。又如社會工作者也不能沒有compassion (愛心或慈悲心)，因為compassion這個字同時含括了感受他人的

表 1 關懷的階段與倫理特質

關懷的階段	倫理特質
關心Caring about	關注
承諾Caring for	責任
給予關懷Care giving	能力
接受關懷Care receiving	回應
共同承擔Care with	多元、溝通、信任、尊重、團結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痛苦和採取行動解除痛苦的意義，而關注就是感受到他人的痛苦。承諾（caring about）的階段是在掌握了他人的需求後，願意承擔滿足需求的責任。關懷本身就是一種負擔（burden），就像投入「母職之人」是在承受重大的負荷，甚至是一種犧牲奉獻，若是真正的關懷就需要承擔起這種道德責任（responsibility）。願意承擔關懷的責任到實際給予關懷（care giving）仍有一段距離，因為有心承擔責任未必有能力（competence）提供關懷，有能力的給予關懷不僅是技術的問題，更是一種道德的議題，因為能力有其時間性（diachronic），當處在沒有能力提供關懷的階段，端看有無道德勇氣去培養能力以實踐關懷的行動。一旦提供了關懷照顧，接受關懷（care receiving）的一方需要給予關懷者回應（responsiveness），畢竟關懷行動是一種關係。從回應的過程當中，提供關懷者能夠理解關懷行動是否能

滿足需求，同時也能進一步的了解產生的新需求。此外關懷的接受者若能以感恩（gratitude）的方式回應，更可強化關懷的關係，激勵提供關懷者對關懷事務更深的承諾。Tronto受到Sevenhuijsen的影響，認為關懷也需要多元性、溝通、信任與尊重的道德承諾，所以提出第五個共同承擔（work with）的階段，再次強調每個人既是關懷照顧的提供者，也是關懷照顧的接受者，面對社會的需求我們有集體的責任共同承擔，同時再次肯定關懷照顧對社會的重要性。

從上述的定義和關懷階段，我們可以歸納出關懷照顧是一種關係（relation）、價值（value）和實踐行動（practice）。關懷倫理和以往的倫理學觀點最大的不同是，義務論、效益論和德行論基本是以個人做出發點，而關懷倫理學則是強調關係。關懷的本質就是一種關係，有供給者和接受者，還有這兩者的利害關係人，

所形成的相互依賴關係。就好像非洲的 *ubuntu* 概念，一個真正的人是屬於社會的一部分，是關係的、共融的、社會的、環境的、靈性的世界之一部分（張英陣，2021）。關懷是一種價值可從兩個部分來看，其一是關懷本身的理念是一種情感性的，關懷出自於滿足他者因依賴和脆弱的需求。也有學者認為關懷本身就是一種德行，具有慈悲、溫馨、利他等特質。另一個關懷的價值是從其影響來看，女性主義者認為關懷照顧的價值可以分成四個面向。一是對個人的價值，對許多人來說，照顧是生命中最大的承諾與報酬；二是普同性的價值，因為任何人缺乏照顧就無法生存及繁榮興盛；三則是社會與經濟的價值，照顧是社會制度的基礎，形成家庭、社群與社會，因而對經濟有很大的貢獻；最後是倫理的價值，跟正義一樣，關懷照顧是民主社會必備的德行（Hubbard, 2004）。最後，價值是一種實踐行動，意即關懷不只是一個人所具有的特質或倫理原則，關懷需要有具體的行動。就像「母職之人」對子女的日常生活照顧、護理師對病患身體的照顧等。

伍、關懷倫理學與社會工作

關懷倫理學的核心價值與社會工作的精神相當契合，Fisher和Tronto對於關懷的定義和社會工作「人在環境中」的理

念是相同的；而從社會工作的初始發展階段到目前有些學者提倡關係為基礎的實務（relationship-based practice）都強調關係在實務中的重要性（許雅惠，2019），這和關懷倫理學的本體論也不謀而合。可是長久以來，社會工作倫理仍以「經濟人」觀點主導的義務論和效益論為主，特別是臺灣的社會工作實務和社會工作倫理甚少結合關懷倫理學的觀點。不過從全球的社會工作發展來看，很慶幸的是關懷倫理學已經開始受到社會工作界的重視，2018年的《全球社會工作倫理原則》（*The Global Social Work Statement of Ethical Principles, GSWSEP*）在國際社會工作倫理議題上首度揭示人類的脆弱性，並確認「脆弱性是人類生存條件普遍存在的一部分」（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chools of Social Work &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Social Workers, 2018），以及2021年國際社工日的主題訂為Ubuntu（張英陣，2021），國際社會工作界在主流的社會工作倫理觀點之外，也正式接受與關懷倫理觀相近的觀點。所以我們也嘗試思考關懷倫理學在社會工作的直服務、社會工作管理與社會政策的關聯性。

一、Jane Addams

社會工作的先驅們大都肯定關係的重要性，但是在實踐行動和倫理觀點與近代關懷倫理學最貼近的應該是Jane Addams

(1860-1935)。Addams和她的好朋友在芝加哥建立霍爾館(Hull-House)，與一群志同道合的人一起生活與服務，而且和當地居民所建立的關係就是一種政治友誼(political friendship)的實踐(Moskop, 2020)。而Addams於1902出版的《民主與社會倫理》被許多學者譽為是近代關懷倫理學的先驅(Anderson, 2004; Hamington, 2004; Shields, 2011)。該書之所以使用「社會倫理」的概念就是因為Addams已經擺脫個人主義的倫理觀點，而強調在民主社會中應該從關係和集體的責任來檢視倫理議題。

Addams和伙伴們與當地社區的居民共同生活，以共事(work with)的態度近距離和居民共同解決問題，所做的事包含各種年齡層和族群的直接服務、勞工權益倡導、公共衛生環境改善、甚至和平倡議等，都具體展現「親身臨在的關懷」(embodied care)。Addams為了從宏觀的社會政治面以「關懷的社會習慣」(social habits of care)改善社會，也就是要運用積極的聆聽、參與、關係的領導和積極投入社會運動等促進社會的成長與繁榮興盛(Hamington, 2004)。Addams所投入於霍爾館的活動與和平運動就是在維繫、持續和修補這個世界，她的關懷理念包含微觀的照顧工作和宏觀的社會政治理念，已經為社會工作奠定了關懷倫理學的基礎。

二、直接服務

國外的社會工作實務中業已採用關懷倫理學的觀點於身心障礙、街友、老人、兒童保護、難民收容、人道援助、健康照顧等領域(Barnes et al., 2015; Pease et al., 2018)。實務的運用基本上以Tronto的關懷五個階段為架構，但特別關注案主的需求、服務使用者參與、關懷的關係和關懷是政治理念。例如兒童保護服務是以關係為基礎的實務，從風險導向的保護服務轉向關懷及情感性的服務，不僅重視兒童的最佳利益，更強調兒童、照顧者與社工員的網絡關係(Harries, 2018)。在對街友服務過程中，重視社工和街友都是關懷的供給者和接受者，彼此是互惠的依賴關係，而且將關懷視為是政治議題方能兼顧對街友的照顧與街友的正義(Coleman, 2018)。在社會工作實務領域中，比較與關懷倫理學格格不入的是身心障礙領域，特別是倡議自立生活運動(independent living movement)服務者，因為該運動倡議者認為照顧(care)、協助(help)等概念造成矮化身心障礙者的地位並貶抑其權力，應該使用「支持」(support)的概念比較恰當。不過已經有些自立生活運動的實踐者開始改變以自由主義和權利為基礎的自立生活理念，逐漸接受身心障礙者和社工本身的脆弱性，採用社會痛苦(social suffering)的概念取代風險管

理，更強調與身心障礙者建立關懷關係，實務上要有更多的家訪和會談（Sawyer & Stanford, 2018）。

從國外社會工作運用關懷倫理學的經驗來看，大致上可解析出是對風險管理和新自由主義的反動。因為著重於風險的評量與風險的控制，以及新自由主義重視個人責任和服務的效率，反而讓服務使用者的服務分崩離析缺乏整合，讓社會工作本身去專業化，造成政府將照顧責任轉移。而關懷倫理學可以讓社會工作回到以身、心、靈、社會的全人為基礎，在以關係為本的實務中更能滿足服務使用者的需求，而且將關懷視為是一種政治理念，更能以關懷照顧為前提，實踐社會正義。

三、社會工作管理

美國的社會工作先驅Mary Parker Follett（1868-1938）被當代管理學界尊稱為「管理學之母」、「管理學的先知」，她在組織管理中強調「循環式回應」（circular response）之過程，意即人類的日常生活都是在「關係」（relating）當中進行，也就是在關係中創造累加價值（plusvalents）（張英陣，2015）。Follett在組織中強調關係的重要性，不僅成為管理學理論中人際關係學派的開創者，也是在組織管理中蘊含了關懷倫理學的觀點。

社會工作實務採用關懷倫理學時雖

有不少批判新管理主義的論述，但在社會工作管理中仍較少直接採用關懷倫理學於管理實務中，倒是在企業管理中已經開始運用關懷倫理學的觀點。關懷倫理學可以做為企業決策的基礎，亦可塑造嶄新的企業文化。目前也已經有一些企業的個案研究，說明關懷倫理學對企業的利害關係人產生正向的利益（Hamington & Sander-Staudt, 2011）。亦有學者提出，在當今的新自由主義經濟體系中，組織管理迫切需要「關懷的管理」（caring management），組織不僅是追求利潤，更應該將關懷列為企業管理的核心，創造一個關懷的組織（caring organization）。在關懷的組織中，以人為中心取代利潤導向，以「互惠之人」（*homo reciprocans*）取代「經濟人」的概念，組織的目標是在維繫人性尊嚴與促進人性發展（Setter & Zsolnai, 2019）。事實上，關懷倫理学的核心觀點最貼近社會工作的專業理念，在社會工作管理中採用關懷倫理學應比企業管理的衝突更少。

四、社會政策

在社會工作中，以關懷倫理學的觀點論述社會政策早於社會工作直接服務與社會工作管理。Sevenhuijsen（1998）接受Tronto關於「關懷是一種政治概念」的主張，從公民權的概念出發，以關懷倫理學的觀點探討社會政策中的倫理議題，

包含依賴、責任、脆弱及信任等，並以關懷倫理學分析荷蘭的兒童福利及醫療照顧政策的社會參與、自主性、選擇、平等、正義和社會團結等，而主張公民權不應從自由主義的權利模式來論述，應回歸以關懷照顧為核心。Hankivsky (2004) 認為社會政策中具有「關懷匱乏」(care deficiencies) 的缺失，所以特別關注社會政策中如何透過關懷照顧滿足人類的需求。她認為關懷倫理學對他人差異、獨特性、特殊性的敏感度與回應，開啟了認識歧視、壓迫及痛苦的新視野，關懷倫理學可以給政府和各種制度提供一種更有人性、成效和堅實的社會政策。也由於關懷倫理學以新的觀點詮釋人類的存在、社會問題、需求和批判政府的回應策略，因此關懷倫理學可以讓社會政策更能實踐社會正義。

近來有更多採用關懷倫理學的觀點批判當代新自由主義所主導的市場導向和責任化 (responsibilisation) 之社會政策，在當今處在全球照顧危機下，社會政策更應著重於促進關懷的民主，更期待未來的道德與政治思維都能以關懷為核心 (Urban & Ward, 2020)。如前所述，我國許多社會政策目標大都建立在自由主義的理論基礎，強調獨立自主，或許未來的社會政策可以注入關懷倫理學的觀點，畢竟關懷照顧是人類生存最重要的條件，即使要藉由社會政策實踐社會正義也需要以

關懷照顧為前提。

陸、結語

當今世界處在一個非常不穩定的狀態 (precarity)，個人主義與市場導向的實務和政策促使生活不穩定更加惡化，太多人因而處在恐懼、社會隔離與暴力的陰影下。關懷倫理學則重新肯定人類的相互依賴關係，是面對當今新自由主義不穩定下所產生的社會革命 (Hamington & Flower, 2021)。關懷倫理學不僅是一種道德哲學的觀點，也是一種實務工作的觀點。國外有鑑於新自由主義和新管理主義對社會工作與社會政策所產生的諸多負面影響，而選擇關懷倫理學作為另一條路徑。事實上，在國外因新自由主義和新管理主義產生的缺失在我國的社會工作實務中也一樣發生，可是我們的社會工作直接服務、社會工作管理及社會政策仍較少採用關懷倫理學的觀點。尤其是當前全球都面臨嚴重的照顧危機，凡兒童托育、身心障礙者照顧或老人長期照顧都是許多民眾所關切的議題，不論是由自己家屬照顧或外籍看護提供照顧也都面臨照顧責任分擔不公平的問題，此刻在照顧實務和政策上也都需要追求關懷民主。過去這兩年的COVID-19疫情應該讓我們更深深體會到每個人的脆弱性，以及每個人相互照顧及相互依賴的重要性。關懷照顧不僅是微視的人際關係

的概念，更是宏觀的政治概念，或許回歸以關懷為核心並運用關懷倫理學是當前社會工作迫切需要的另類出路。

（本文作者為亞洲大學社會工作學系教授）

關鍵詞：關懷倫理學、關懷、照顧

參考文獻

- 方志華（2001）。〈關懷倫理學相關理論開展在社會正義及教育上的意涵〉。《高等教育集刊》，46，31-51。
- 布芮尼·布朗（Brown, B.）（2013）。《脆弱的力量》（洪慧芳，譯）。馬可孛羅。（原著出版年：2012）
- 布蘭達·杜布瓦、卡拉·克羅格斯拉德·米利（DuBois, B., & Miley, K. K.）（2021）。《社會工作概論》（張英陣、許雅惠、潘中道，譯）。雙葉。（原著出版年：2018）
- 修伯特·喬利、卡蘿蘭·藍柏特（Joly, H., & Lambert, C.）（2022）。《企業初心：未來企業的新領導準則》（劉復苓，譯）。天下文化。（原著出版年：2021）
- 張英陣（2015）。〈社會工作的職場靈性〉。《靜宜人文社會學報》，9（1），159-186。
- 張英陣（2021）。〈Ubuntu & Fratelli Tutti：社會工作價值的反思〉。《社區發展季刊》，175，312-323。
- 許雅惠（2019）。〈我們能做朋友嗎？：反思保護性社會工作的專業關係〉。《臺灣社會福利學刊》，15（2），57-108。
- 游惠瑜（2005）。〈諾丁的關懷倫理學及其問題〉。《哲學與文化》，32（3），95-109。
<https://doi.org/10.7065/MRPC.200503.0095>
- 衛生福利部（2015）。《社會救助法》。
- 衛生福利部（2021）。《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
- Anderson, M. E. (2004). Jane Addams' democracy and social ethics: Defending care ethics. *Macalester Journal of Philosophy*, 13(1), Article 2.
- Barnes, M., Brannelly, T., Ward, L., & Ward, N. (2015). *Ethics of care: Critical advances i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Policy Press.
- Bergman, R. (2004). Caring for the ethical ideal: Nel Noddings on moral education. *Journal of Moral Education*, 33(2), 149-162. <https://doi.org/10.1080/0305724042000215203>
- Coleman, A. (2018). I've got your back: Learning with homeless people about care, mutuality and solidarity. In B. Pease, A. Vreugdenhil, & S. Stanford (Eds.), *Critical ethics of care in social work: Transforming the politics and practices of caring* (pp. 74-83). Routledge.

- Collins, S. (2015). *The core of care ethics*. Palgrave Macmillan.
- Diedrich, W. W., Burggraeve, R., & Gastmans, C. (2006). Towards a Levinasian care ethic: A dialogue between the thoughts of Joan Tronto and Emmanuel Levinas. *Ethical Perspectives*, 13(1), 33-61.
- Engster, D., & Hamington, M. (Eds.). (2015). *Care ethics and political theo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Fineman, M. A. (2008). The vulnerable subject: Anchoring equality on the human condition. *Emory Law Journal*, 20(1), 1-23.
- Gilligan, C. (1977). In a different voice: Women's conceptions of self and morality. *Harvard Educational Review*, 47(4), 481-517. <https://doi.org/10.17763/haer.47.4.g6167429416hg510>
- Gilligan, C. (1982). *In a different voice: Psychological theory and women's development*.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Gilligan, C. (2018). Revisiting "in a different voice". *LEARNing Landscapes*, 11(2), 25-30. <https://doi.org/10.36510/learnland.v11i2.942>
- Groenhout, R. (2004). *Connected lives: Human nature and an ethics of care*. Rowman & Littlefield.
- Hamington, M., & Flower, M. (2021). *Care ethics in the age of precarity*.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Hamington, M., & Sander-Staudt, M. (2004). *Applying care ethics to business*. Springer.
- Hamington, M. (2004). *Embodied care: Jane Addams, Maurice Merleau-Ponty, and feminist ethics*.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 Hankivsky, O. (2004). *Social policy and the ethic of care*.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
- Harries, M. (2018). Protecting children within a relationship-based feminist care ethic. In B. Pease, A. Vreugdenhil, & S. Stanford (Eds.), *Critical ethics of care in social work: Transforming the politics and practices of caring* (pp. 94-104). Routledge.
- Hubbard, A. (2004). The myth of independence and the major life activity of caring. *The Journal of Gender, Race & Justice*, 8, 327-359.
-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chools of Social Work &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Social Workers. (2018, July 2). *The global social work statement of ethical principles*. <https://www.ifsw.org/global-social-work-statement-of-ethical-principles/>
- Kittay, E. F. (2020). *Love's labor: Essays on women, equality and dependency*. Taylor & Francis.
- Lloyd, L. (2006). A caring profession? The ethics of care and social work with older people. *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Work*, 36(7), 1171-1185. <https://doi.org/10.1093/bjsw/bch400>
- MacIntyre, A. (1999). *Dependent rational animals: Why human beings need the virtues*. Duckworth.
- Mackenzie, C., Rogers W., & Dodds, S. (2014). Introduction: What is vulnerability, and why does it matter for moral theory? In C. Mackenzie, W. Rogers, & S. Dodds (Eds.), *Vulnerability: New*

- essays in ethics and feminist philosophy* (pp. 1-29).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Miller, S. C. (2020). From vulnerability to precariousness: Examining the moral foundations of care ethic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hilosophical Studies*, 28(5), 644-661. <https://doi.org/10.1080/09672559.2020.1804239>
- Moskop, W. W. (2020). *Jane Addams on inequality and political friendship*. Routledge.
- Noddings, N. (2002). Caring, social policy, and homelessness. *Theoretical Medicine and Bioethics*, 23, 441-454. <https://doi.org/10.1023/A:1021385717732>
- Noddings, N. (2010a). Moral education in an age of globalization. *Educational Philosophy and Theory*, 42(4), 390-396. <https://doi.org/10.1111/j.1469-5812.2008.00487.x>
- Noddings, N. (2010b). *The maternal factor: Two paths to moralit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Pease, B., Vreugdenhil, A., & Stanford, S. (2018). *Critical ethics of care in social work: Transforming the politics and practices of caring*. Routledge.
- Ruddick, S. (1980). Maternal thinking. *Feminist Studies*, 6(2), 342-367. <https://doi.org/10.2307/3177749>
- Sawyer, A. M., & Stanford, S. (2018). The risks of care and caring about risk in mental health. In B. Pease, A. Vreugdenhil, & S. Stanford (Eds.), *Critical ethics of care in social work: Transforming the politics and practices of caring* (pp. 63-73). Routledge.
- Setter, O., & Zsolnai, L. (2019). *Caring management in the new economy socially responsible behaviour through spirituality*. Palgrave Macmillan.
- Sevenhuijsen, S. (1998). *Citizenship and the ethics of care: Feminist considerations on justice, morality and politics*. Routledge.
- Shields, P. M. (2011). Jane Addams' theory of democracy and social ethics: Incorporating a feminist perspective. In M. J. D'Agostino, & H. Levine (Eds.), *Women in public administra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pp. 15-34). Jones & Bartlett Learning.
- Tronto, J. C. (1993). *Moral boundaries: A political argument for an ethic of care*. Routledge.
- Tronto, J. C. (2013). *Caring democracy: Markets, equality and justice*.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 Tronto, J. (2017). There is an alternative: Homines curans and the limits of neoliberalism.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are and Caring*, 1(1), 27-43. <https://doi.org/10.1332/239788217X14866281687583>
- United Nations. (2019). United Nations principles for older persons. <https://www.ohchr.org/en/instruments-mechanisms/instruments/united-nations-principles-older-persons>
- Urban, P., & Ward, L. (2020). *Care ethics, democratic citizenship and the state*. Palgrave Macmillan.
- Weick, A. (2000). Hidden voices. *Social Work*, 45(5), 395-402. <https://doi.org/10.1093/sw/45.5.395>